

第十章 民国时期



第一节 社会背景

1912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告全国同胞书》等文件，宣告中华民国成立。2月8日，陆荣廷在桂林通电就任广西都督。民国期间，广西行政区域仍称广西省，但将清制的府、州、厅全部改为县，形成省、道（区、市）、县三级建置。1912年，全省分为6个道，即桂林道、苍梧道、柳江道、南宁道、田南道、镇南道，共辖90个县。1921年8月，广西奉孙中山之令废除道制，各县行政直接由省辖。对原来实行土司制的地方，继续改土归流，1928年完成改土归流。

民国成立之初，广西省政府根据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法令、政策，结合本省实际，制订颁布了一些具有民主色彩的地方行政法规。在经济方面，省政府施行“清赋”政策，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修建公路，鼓励兴办农林业。手工业、商业也有所发展。教育方面，学校和招生数量均比清末有所增加，也输送一些学生出国留学，包括留日的美术学生。民国建立的头10年，广西境内没有发生大的战争，社会还是比较安定的。当时，广西省政府受制于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事集团（史称旧桂系）。在北洋军阀与西南军阀对峙期间，桂系集团在西南军阀中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在帮助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讨袁护国战争、援湘护法战争中有较大影响。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初期，曾希望依靠这支力量，但陆荣廷为保存广西的既得地盘，处处排斥孙中山，致使护法运动失败。最后孙中山调动粤、湘、滇、黔数省军队进攻广西，摧毁了陆荣廷桂系集团，广西省政府也随之解散。

1922-1925年，广西自治军风起云涌，各自割地称雄，全省陷入混乱局面。这个时期，桂东南的自治军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崛起，他们依附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先后打败陆荣廷、沈鸿英两支势力强大的自治军，并驱逐入桂的滇军，平定统一了广西，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军事集团统治广西的时期开始了。1926年，新桂系集团在南宁组建广西省政府，集

中统一民政大权，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推行“三自三寓”政策，对县长实行考任制度。1934年，省政府公布《广西建设纲领》，通过“发展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的办法，振兴工业，在全省开展规模较大的经济、文化建设。在教育方面，几乎实现每村一所国民基础学校，每乡一所中心国民基础学校，各县大都办有中学。1928年，省政府拨款兴办广西大学，至1943年已发展成为有理工、农、法商三个学院的综合性国立大学。最值得称道的是，当时的广西省政府还聘请一批全国著名学者、教授到广西参加经济、文化建设工作。

20世纪30年代，在当时处于内忧外患的中国，广西的建设发展表现是非常突出的，当时的《纽约时报》曾把广西评为全国的模范省。1936-1944年，桂林成为抗战大后方。“桂林抗战文化城”聚集了众多全国文化名人（包括艺术家），成为中国抗战文化的重镇，对广西文化建设，特别是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并写就了广西历史上辉煌的篇章。

第二节 美术概况

民国时期，广西美术得到极大的推动和发展，现当代美术形态开始形成。一些艺术家到广西活动，使中国现当代美术在广西找到了发展的沃土，实现了传统中国山水画在当代的转型。特别是新桂系李宗仁等人主政广西以来，重视文化教育，聘请一些名人（如黄宾虹、徐悲鸿等）到广西讲学办展。这些名人不仅为广西美术教育做出贡献，还留下多幅表现广西的作品。

广西近现代最早的美术组织广西美术会于1932年在南宁成立，陈宏任会长。广西美术会开展了大量的展览活动，促进了广西现当代美术的发展。

在1936-1944年，由于北平、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相继沦陷，全国的文化名人和机构分散到了重庆、桂林和昆明。而新桂系所采取的开明政策以及对文化的重视，吸引了全国绝大部分文化名人来桂林，使桂林于1937-1944年成为抗战时期的文化名城，这一盛况直至1944年9月湘南战局失利，桂林大疏散。

当时，会集于桂林的艺术家有徐悲鸿、何香凝、张安治、陆其清、丰子恺、关山月、曹墨侣、赵少昂、黄新波、余所亚、廖冰兄、陈树人、陈海鹰、帅础坚、阳太阳、陆田等250多人。这些名家大多曾留学日本、欧洲和苏联。他们在桂林创作、开办教育、创办刊物、开展抗战美术运动，既为抗战做出了贡献，又为日后的广西乃至全国的现代美术创作和教育奠定了基础。

1936年冬，在徐悲鸿的建议下筹建桂林美术学院，拉开了抗战时期桂林乃至广西美术教育活动的序幕。1939年10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成立，抗战时期桂林美术文化活动开始。1938年3月在桂林创刊的《战时艺术》，由国防艺术社美术部主办，是广西抗战早期唯一的综合性艺术刊物，有美术、摄影、戏剧、音乐等内容。在1936-1944年，桂林出版的不同类型的美术杂志达26种，出版画册、画集、连环画107种；举办各类画展宣传抗战，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89次。1943年是举办画展最多的一年，共举办了39次。

抗战时期，桂林美术运动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切为了抗战，以主张抗战为舆论导向，以现实主义绘画理论指导创作，宣传抗战，鼓舞群众抗战到底。桂林抗战文化城美术运动对于在抗战

大后方宣传抗日，宣传团结进步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桂林文化城这段历史同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都是紧密相关，有着多方面联系的，是占有一定历史地位的，也是抗战时期美术运动、广西美术史发展的重要篇章。

除了桂林抗战文化城美术运动之外，民国时期广西也有部分画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创作。钟惠若、阳太阳、帅础坚、罗宝珊等人分别被公派或自费到日本和我国上海、杭州等地学习美术，他们对后来广西的美术教育和美术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

民国时期，西画开始传入广西，封建制度的消亡和共和制度的实施，新旧文化的激荡，使中国画艺术在广西的发展在新美术的冲击下受到影响。特别是在1937-1944年，抗战美术、新美术极大地影响了广西的美术创作，出现了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美术创作形态。广西的美术教育也得到了大发展，尤其是抗战时期徐悲鸿在桂林倡导创办的美术教育活动，是广西现代美术教育发展的基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广西美术教育有着深刻的影响。现当代广西美术创作雏形在民国时期形成，这是广西美术发展的历史转折和里程碑。

第三节 具体美术作品

一、本地画家

民国时期，广西本土的画家继承了清代绘画的传统，并有所发展。和清代一样，民国时期广西绘画的中心仍集中于桂林。据民国时期莫固所辑《桂林画录》记载，民国时期桂林籍的画家有17人，其中女画家2人，他们是何锡龄、黄以材、黄蓊、罗树仁、陈秉信、王翼、黄元、孙贻、侯晋祥、欧阳昭、许鉴、许冶、白瘦渔、秦完尧、阳朗然、袁佩芳（女）、陈莹华（女）。

这些画家，何锡龄和黄蓊均曾于康有为在桂林讲学期间，作为康有为的学生，聆听过他的教诲。此后他们加入了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活动。

何锡龄：

广西桂林人。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和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康有为两次来桂林讲学，何锡龄与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靳永芳都是康有为的学生。后来唐景崧从台湾回桂林，成立兄弟会，培养人才，反对清政府，何锡龄夫妇均为兄弟会的骨干。1921-1922年，孙中山到桂林督师北伐，何锡龄夫妇将家中精心培植的盆景和家中珍藏的书画拿出来，布置孙中山的住宅和办公室，并主持了“孙大帅入桂欢迎仪式”，孙中山在其著作《建国方略》和《建国大纲》上亲笔签字，作为礼物送给他们。1925年，孙中山不幸病逝，何锡龄悲痛欲绝，不久病逝。其二儿子何信在1938年3月间台儿庄一次空战中，在临城枣庄上空和敌机交战，在击落多架敌机后，驾着飞机撞向敌机，壮烈牺牲。何锡龄画作鲜见流传。

黄蓊（1883-1939）：

字毅先，别字逸庵，号菊轩，今广西桂林临桂区庙岭镇大井头村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就读于广仁学堂，常到圣学会听康有为讲学。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入体用学堂（1902年更名广西大学堂）。自广西大学堂毕业后，即与同学扈轸、秦焰、廖延素等创办桂林公学。桂林公学为桂林第一所由公众合资建立的学堂。不久，清廷两广学务公所派他去南洋爪哇巴达

维亚城（今印尼雅加达市）任中华学堂教员。黄蓊到爪哇后，光绪三十年（1904年）参加兴中会，次年秋转入同盟会。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回到桂林，掌管桂林公学教务。次年，兼任桂林第一家日报《桂林报》的编辑。同时，还创办通俗教育阅报社。后来，又和友人自筹资金开办一所义学“半夜学堂”，专招青年店员和作坊工人夜间学习。宣统二年（1910年），参加创办桂林同盟会机关报《南报》。1912年，国民党广西支部在桂林成立，黄蓊任总干事，兼办桂林《民报》。1915年，黄蓊任桂林模范小学校长时，因公开反对袁世凯称帝，被迫辞职回家。1917年，黄蓊投身军界，历任广东陆军第六军军部秘书长、参谋长，广西省公署秘书兼军务处军需课课长、广西讨贼军总指挥部顾问、广西陆军第二军总指挥部军需科科长兼梧州印花烟酒局局长、国民革命军第七军驻梧州办事处主任兼禁烟督察局局长。1927年2月，任广西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6月又兼粮运局局长、清理田亩局局长。1930年，任广西第一方面军战时政治委员会委员兼财政处处长。次年，复任广西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并兼国民政府财政部广西特派员公署特派员。1933年，辞去所兼的财政厅厅长职。1934年，兼任广西省政府秘书长。次年5月，改兼广西银行董事长。1936年6月，改任广西银行行长。1937年，参加湘桂铁路筹建工作，铁路竣工后，任湘桂铁路管理局监事会监事。1939年8月23日，因心脏病去世。黄蓊擅长书画。著有《逸庵存稿》70余万字，抗日战争时毁于战火。

民国时期，广西画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其中的代表人物有许鉴和张林溶。

许鉴：

字镜澄，又字衡斋，广西桂林人。工花卉，又擅刻瓷。从广西博物馆藏其《设色梅鸟立轴》看，其梅的画法师法传统，有金农之意。

张林溶：

广西桂林人。工绘画，尤擅芦雁。所作芦雁，师法边寿民，然而画得更为自由活泼，笔意洒脱，动态生动，富有生活情趣。现广西博物馆藏有其多幅芦雁作品。

民国时期，广西开始有画家到外地学习绘画技法，最早的是帅础坚。之后，罗宝珊到杭州学习绘画。

帅础坚（1890—1963）：

字建基，原籍江西吉安。少年时师从唐子超、周云樵学习绘画，早年毕业于政法学堂，1919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回广西。帅础坚是开创广西近现代美术教育的教育家，曾任广西省第二师范学校、桂林师范学校、桂林市省立第三中学、桂林中学等校图画教师，并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函授部学习油画。1934年，在南宁创设心心画室。20世纪30年代中期，创办桂林研美画室，与徐悲鸿、张安治、沈懋、马万里、张家瑶等人过从甚密。抗战时期从事救亡宣传工作。20世纪40年代，曾任私立桂林榕门美术专科学校、广西艺术师范学校、榕城画院等校教师。1941年，创作的巨幅《林则徐禁烟图》获广西美术作品一等奖。1945年始，居阳朔达14年。20世纪50年代初，曾任阳朔县文化馆副馆长。1956年，调入广西群众艺术馆。1958年起，在广西艺术专科学校、广西艺术学校任中国画教师。曾为广西美术家协会理事、

广西文史研究馆馆员。早年与徐悲鸿合作《山鸡》。帅础坚育有子女七人，子孙大多从事艺术教育和创作工作，其子帅立志和帅立功成绩尤为显著，擅长画山水、人物、花鸟，画风朴实，中西技法并用，笔墨苍劲，意趣隽永。帅立功晚年作品《芙蓉》《兴坪雨渡》等为广西博物馆收藏。帅础坚是著名画家阳太阳少年时期的美术启蒙老师。



◎帅础坚《留公乡午舫》中国画
132cm×68cm 1956年



◎罗宝珊《梅兰图》中国画
149cm×39cm 11937年

罗宝珊(1910—2003)：

生于广西百色。自幼即喜欢绘画，上中学时得到图画教师的指导，便立志从事绘画。1932年，考入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先学西画，后学中国画，历时6年，与王朝闻同届，与李灿霖同班。罗宝珊上学时，素描由方干民、蔡威廉执教，油画由林风眠、吴大羽等教授，中国画

得潘天寿悉心教诲。罗宝珊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常有美术理论文章发表于学校的《艺星》月刊和上海《艺风》杂志。1935年，他的中国画作品《松石》入选了全国第二届美术展。罗宝珊深得潘天寿器重，常为潘天寿打理事务，多幅作品得到潘天寿的题字鼓励。1938年夏，罗宝珊毕业时，潘天寿还专门画了一幅山水画送给他，上有题款：“不是东坡赤壁游，一年不作画，偶然执笔只觉荒索之气满纸矣。奈何宝珊仁弟将归广西作此志别。廿七年盛暑懒寿时同客沅陵。”

罗宝珊1938年夏毕业回到广西后，曾在桂林举办个人画展，之后在武宣、来宾多所中学任美术教师、教导主任、校长等职。1950年，任广西艺术专科学校副教授兼美术科主任。1953年，调入中南美术专科学校。1954年，其油画静物《苹果》参加湖北省第一届美术展览会，被文化部购藏。1958年，罗宝珊被错划成“右派”，在农场劳教。1962年，罗宝珊得以解除劳教，到柳州定居直至去世。在柳州期间，罗宝珊曾下到周边县乡给人画像，或在家为学画者辅导培训。后来，他进入柳州工艺美术厂工作，在厂里做设计，画镜画，做石雕。1978年，罗宝珊获得改正。1979年，罗宝珊担任了三期柳州市工人俱乐部举办的工人业余美术学习班、书法学习班的教学、辅导工作和一些基层单位的职工美术辅导工作；1980年，罗宝珊在柳州举办个人画展20天，展出油画、中国画110幅。罗宝珊在柳州与广大美术爱好者常有往来，后应邀担任柳州画院顾问、柳州市书法家协会顾问、柳州市老年书画研究会顾问等。2003年，罗宝珊在柳州去世。2013年，罗宝珊家属按照其遗愿捐赠118件作品给广西博物馆。

罗宝珊的绘画中西并重，他不仅擅长中国画写意花鸟，也擅长油画，并将油画技法运用到中国画当中，画作造型简括，风骨遒劲，古朴清逸。

民国时期广西也有画家到日本留学，他们是钟惠若和阳太阳两人。

钟惠若（1908—1999）：

出生于广西贺县（今贺州市），1924年考入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学西画，1927年到上海新华艺术大学就读，1931年毕业之后作为公派留学生赴日本，在东京美术学校深造，三年之后返回广西桂林。1935年在桂林初级中学任教，与木刻家李桦一起学习、研究木刻。1936年举办的个人木刻展，为桂林的首次木刻展。展出后出版的《钟惠若木刻集》，由徐悲鸿题写书名、陈宏撰序。此书现藏于桂林市图书馆。1937年6月，由钟惠若、李漫涛、沙飞、洪雪邨等人发起组织成立广西版画研究会，会员40多人，钟惠若被推选为秘书长。1937年底，举办第二次个人木刻展。1938年1月9日，钟惠若出席由广西省艺术社召集的、在乐群社召开的广西艺术工作者会议，并被推举为“广西艺术工作者协会”筹备会委员。1938年暑期，应徐悲鸿之邀，为徐悲鸿倡办的广西省中等学校艺术教员暑期讲习班讲课。1941年10月、1942年3月，两次参加陈仲纲、阳太阳等联合举办的十一人油画展。1941年8月，钟惠若、龙月庐、张家瑶、关山月、马万里等10余人发起筹建桂林美术专科学校。1947年，钟惠若被广西艺专聘为水彩画教师。“文革”后，钟惠若返回家乡贺县，后来从事水彩艺术创作。1999年9月14日，钟惠若在贺州去世，享年91岁。钟惠若早期的绘画原作不复存在，但其晚年有大量水彩作品传世，多为写生，表现具体而手法写意，用色典雅又具光色关系，具有较高的艺术格调。



©钟惠若《漓江》中国画 27cm×39cm 1978年



©阳太阳《林间》油画 43cm×52cm 1935年

阳太阳(1909—2009):

1909年12月6日生于桂林市郊芦笛岩下庙门前村(今新华村),小名德亨,后取名阳焕。8岁进桂林模范小学读书。课余拜私塾教师董任辅习书画。15岁考入桂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从帅础坚接受最初的西画教育。1929年,考入上海美专西画系,与杨秋人、蔡若虹等同时受业于刘海粟、王济远、潘思同等。1931年,改名阳太阳,并转学到上海艺专西画研究科,受业于王济远、陈抱一、陈之佛、关良、倪貽德等,毕业后在上海世界书局任美术编辑。同年,在上海与庞薰粟、倪貽德等人创办决澜社,提倡新绘画。1935年,入日本大学研究各国绘画艺术并积极创作。其油画作品入选世界性大型美展日本二科美展,与马蒂斯、罗丹、戈雅、勃拉克等大师的作品同场展出,并同时印入画册,被誉为“中华之夸”。1937年,他放弃去巴黎进入世界画坛的计划,回国投入抗战,发表诗文,创作大批绘画作品,反映斗争生活。同年创编《诗创作》杂志,加入全国作家协会,创办初阳美术学院,任院长。参加过民主爱国运动。1949年,与王琦、黄永玉、关山月、张正宇等人在香港创办“人间画会”。主笔绘制巨幅毛泽东像(30 m×10 m),悬挂于广州爱群大厦,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后,历任华南文艺学院教授、教务主任,广西艺专校长,湖北中南美专副校长,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广西艺术学院院长,广西书画院院长,桂林中国画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广西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广西政协副主席等职。1957年,阳太阳与傅抱石率中国美术家代表团赴东欧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等国访问交流,并多次应邀赴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举办个人画展。2006年,获文化部、中国文联颁发的“2006年中国造型艺术研究成就奖”(终身成就奖)。2008年,作为漓江画派开拓者、旗手和领军人物的阳太阳被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2009年8月25日去世,享年100岁。

阳太阳早年从事现代艺术运动,是绘画革新的积极参与者。抗战期间,在桂林又积极投身于抗战美术运动,是抗战美术运动的主要干将。此外,他还积极从事美术教育工作,为广西的美术教育做出杰出的贡献。晚年,阳太阳主要进行中国画和水彩艺术创作,他的作品秀丽而老辣,富有个人特色,在传统与创新上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帅础坚、罗宝珊、钟惠若、阳太阳走出广西,到外地甚至国外学习西画或“海派”绘画,

引进现代美术教育，是广西现代美术的主要开拓者。

二、名家旅桂活动

此处单列“名家旅桂活动”一小节，记述几位画家在广西的美术活动，而不把他们归入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美术活动中，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有的画家在广西的时间短，并没有参加桂林文化城抗战美术活动，如黄宾虹、张大千。二是有的画家对广西美术教育影响巨大，需单列记述，如徐悲鸿、丰子恺、马万里。而齐白石在广西活动期间实际上是在清末，但他与同时代的徐悲鸿、张大千、黄宾虹等齐名，其美术活动和主要影响是在近现代，因此也放在此处记述。

1. 齐白石与广西。

齐白石(1864-1957)的自传体传记《白石老人自述》记述了他在1902-1909年离开家乡外出游历的“五出五归”，其中后“三出”就在广西。第一次是“(1905年)七月中旬，汪颂年约我游桂林。……我在桂林，卖画刻印为生”。至1906年春，齐白石从桂林到钦州(当时钦州属广东)，寻访在钦州从军的四弟和长子，住在同乡好友郭葆生家，为他捉刀应酬，并教如夫人画画。第二次是1907年春节后，应郭葆生之约，又到钦州。此次游了肇庆，去了东兴，过北仑河，游览越南芒街风光。现存有当时画的《东兴山水》。第三次是1909年2月初，齐白石再次到钦州，去接四弟和长子回家。他在钦州度过了整个夏天后才返乡。



◎齐白石《独秀峰》中国画 84cm×21cm 1906年

齐白石对桂林、钦州有着很深的情感。在《齐白石谈艺录》中与胡佩衡论画时他曾说：“我在壮年时代游览过许多名胜，桂林一带山水，形势陡峭，我最喜欢。别处山水，总觉不新奇，就是华山也是雄壮有余秀丽不足。我以为，桂林山水既雄壮又秀丽，称得起‘桂林山水甲天下’。所以，我生平喜画桂林一带风景，奇峰高耸，平滩捕鱼，即或画些山居图等，也都是在漓江所见到的。”他在所作的《桂林山》（1924年）以及他赠给老舍的《雨耕图》（1952年）重题旧诗中写道：“逢人耻听说荆关，宗派夸能却汗颜。自有心胸甲天下，老夫看熟桂林山。”

齐白石的山水画不多，在自述中他明确说道：“五十岁后，懒于多费神思，曾在润格中订明不再为人画山水，在这二十年中，画了不过寥寥几幅。”他之所以画山水少，是因为“我画山水，布局立意，总是反复构思，不愿落入前人窠臼”。而在齐白石少量的山水画中，有四幅相似的《独秀山图》，这为我们研究他的艺术思想提供了绝佳的材料。

1906年的《独秀山图》。齐白石在《白石老人自述》中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一九〇六），我四十四岁。在桂林过了年，打算要回家，画了一幅《独秀山图》。

齐白石原为木匠，20岁时开始习画，从临《芥子园画谱》开始，后以画肖像谋生。27岁时向谭溥（号荔仙）学习山水。38岁时他曾为一名江西盐商作中堂青绿山水《南岳图》12幅，得润银320两。可见，他早期的山水画有扎实的基础。齐白石曾在《宁波画稿》上题：“余近来画山水之照，最喜一山一水，或一丘一壑……”不知这种构图样式是不是在画《独秀山图》时确立？

1906年的《独秀山图》画有两幅，一幅为写生画稿，另一幅则是整理后送人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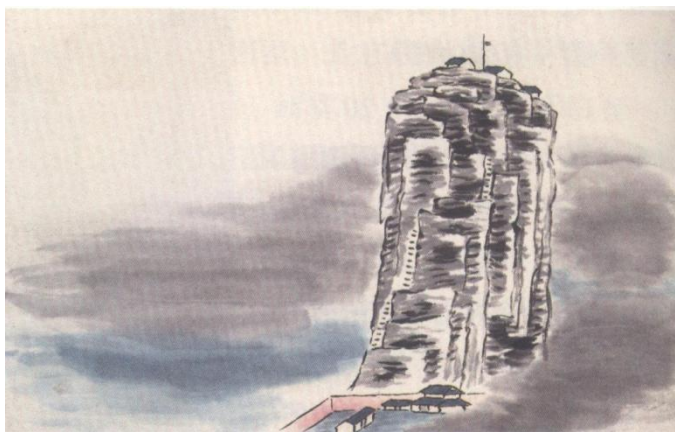
◎齐白石《独秀山图》中国画
75cm×40.4cm 1906年



◎齐白石《独秀山图》中国画
30cm×48cm 1910年

1910年的《独秀山图》。在“五出五归”之后，齐白石“还把游历得来的山水画稿，重画了一遍，编成《借山图卷》，一共画了五十二幅。……廉石和仲言，都说我远游归来，画的境界，比以前扩展得多了”。原有的52幅《借山图卷》，现在只剩22幅，其中有重画的独秀峰。与原图相比，为了适合图册的尺幅改竖幅为横构图。改过的构图，把居中的山峰移向了右边，隐去了远山和山面屋舍右边的树木，隐去的部分及左边构图空出的部分，以淡墨长线横抹的云雾替代，作为主体的山峰，在画法上比原图更为简略。

此幅《独秀山图》属于整理画稿性质，也算是变体画。因为作画的时间与上一幅相差不远，在处理手法上也相差无几。不过与上幅比起来，重画的这一幅明显简练了许多，主题更加突出，在意境的渲染和表现上更为强烈。



◎齐白石《借山图之五独秀山》 纸本设色画
30cm×48cm 1910年



◎齐白石《独秀山图》中国画
48cm×30cm 1927年

1927年的《独秀山图》。1927年，齐白石又重画《借山图卷》，名为《自临借山图卷》，卷中他也重画了《独秀山图》。重画后的《独秀山图》仍为方构图。主体山峰占右边一半，在山峰画法上，变有规律的细线勾勒和短线点染为浓淡墨相间的长短线结合的涂抹，画得随意、大气、老辣，而变幻万千。赭色的墙也改为暗朱色，远处的云雾以规整并排的淡墨横线画成。

此幅作品所作的时间距前两幅约有20年，画于齐白石“衰年变法”之后，因此，在艺术处理手法上与前两幅有明显不同，呈现出齐白石艺术成熟时期老辣、苍茫的风格。

齐白石三画《独秀山图》，不仅为我们展示了他对景写生的处理手法，也体现了他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不断进取的精神，记录下他与桂林割舍不断的情缘。

齐白石在自述中还讲述了他“第四出”到东兴、越南游玩的事，其中提到的画《绿天过客图》收入《借山图卷》中，现《绿天过客图》原图无从考证，倒是在东兴所画的一幅图景《东兴山水》，为那次东兴之旅留下纪念。

此图右边画一房舍，房舍上数只昏鸦高飞。屋内一人盘腿坐地，屋前有一棵树直立，树的左边为近石，远山，中间是一排篱笆。整幅作品景物简略、平朴，用笔工、写兼具，简练、肆意而有力。构图取景明显

与传统的山水画不同，是从实景有感而作的，传达出浓郁的伤怀意绪。这幅作品，是齐白石脱离画谱程式，而个人风格初见端倪的作品。画面左边落款为：“璜时己酉四月同客东兴。”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为这件作品留下了确实的信息。款下盖的是白文“臣璜之印”。

遗憾的是，齐白石 1907 年间在钦州所画的荔枝图，至今未见有传世。但对于钦州，他是情有独钟的。他曾有题款称自己为“天涯亭过客”，并刻有一方“天涯亭过客”章。此外，他常常以荔枝入画，并写书法赞颂荔枝为“果第一”，有篆书题“果味无双”，隶书题“入图第一”，行书题“名园第一”“名园无二”。齐白石爱吃荔枝、画荔枝，始于钦州，这有他的题款为证，他在一幅《荔枝蜻蜓图》上题“寄萍老人齐白石自钦州归后始画荔枝”，另一幅则写“园果无双，予曾为天涯亭过客，故知此果之佳”。他爱吃荔枝的程度达到“远游不复似当年，一月钦州食九千”。晚年回忆起钦州时，他写《思食荔枝》诗称：“此生无计作重游，五月垂丹胜鹤头。为口不辞劳跋涉，愿风吹我到钦州。”他怀念壮年之游，思念之情，溢于言表。荔与“利”谐音，荔枝象征吉利如意。齐白石画荔枝往往题上“大利”“四利”“大吉大利”“太平吉利”“平安吉利”“平安多利”等落款，既有祈盼吉利之意，又有怀旧之情。他的画室里，墙壁上悬挂的即是他 1936 年画的《荔枝篮图》，他对荔枝乃至钦州的情感，可见一斑。

齐白石常常说“我绝不画我没有见过的东西”，他把在广西的所见、所感，画成了动人的艺术作品，可见广西的一方水土，滋养过齐白石的艺术。在广西的这段岁月，齐白石有机会临摹了前辈大师的作品，他的绘画艺术又有了提升。齐白石在广西的三次履痕，对他的艺术有着深远的影响，而齐白石崇尚真、崇尚自然的艺术观，也给广西艺术家以启发。

2. 黄宾虹与广西

黄宾虹(1865-1955)曾两次到广西：一次是 1928 年夏，应当时的广西省教育厅邀请，赴桂林为广西夏令讲学会讲学；另一次是 1935 年夏，应当时的广西省政府邀请，到南宁为广西省中等学校教职员暑期讲习班讲学。黄宾虹的这两次广西讲学，均与他的忘年交、国学大家陈柱（时为交通大学教授）相关。陈柱是广西北流人，比黄宾虹年轻 20 多岁，与黄宾虹相识于上海，因为热爱书画，尤其敬佩黄宾虹，两人遂成忘年之交。陈柱与黄宾虹不仅有论画信札往来，后来还让三女陈蕙英师从黄宾虹学画。黄宾虹的两次入桂讲学，即是陈柱推荐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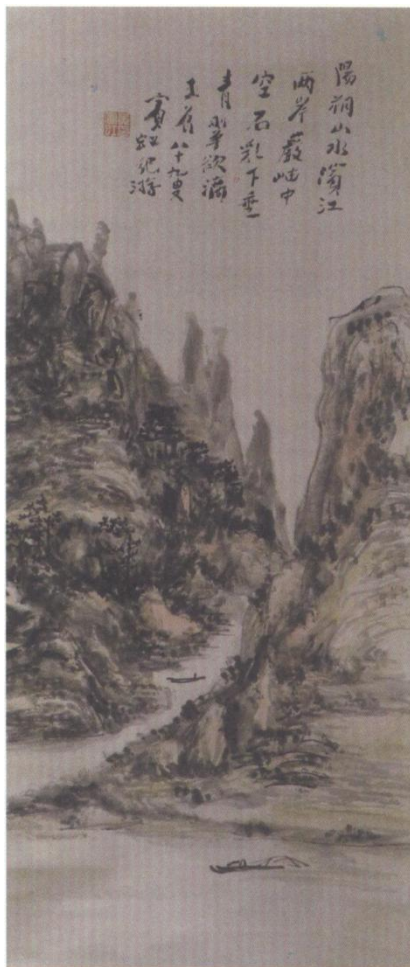
1928 年，黄宾虹初次到广西。由上海到香港、广州、梧州，再逆水而上经昭平、平乐、阳朔至桂林，一路缓行，黄宾虹均作画不息。陈柱在《守玄阁文稿选》的《忆旧游》一文中说：“当吾随老画家（黄宾虹）游桂林也，每遇一名胜，则必询其地名，详其古迹，而黄先生则必取笔与纸为之写其形态，貌其草木。凡自昭平以至桂林，匪不有名胜，名胜匪不游，游匪不画，凡游共二十余日，写真数百幅矣。黄先生为余画自昭平至桂林长卷凡三丈许，日《八桂清游图》。”而陈柱在其《八桂清游图记》中，也详细记载了此行的途中所见：“由是而阳朔，而凉风，而桂林，忽水忽山，水青于蓝而寒于冰，山瘦于僧而多于人，举目而望，但见山不见人也。”此

外，他还写了昭平的景象：“远望黑云如墨，又如石壁千万块，欲从天边坠，可称快意矣。石峰岿然，状甚雄伟，如金刚怒立，森严令人可畏……”

黄宾虹游览桂林之后，便为广西夏令讲学会讲授金石学说。此次的广西讲学之行，既是黄宾虹初次入桂，又是他脱开古人粉本，面对真山真水写生的艺术转变的初始时期。这一时期，他把对传统书画及画论的研习，与真山真水相对照，以真山真水印证古人，由“师古人”转而“师造化”，对景作画，逐渐探索自己的绘画风格。

黄宾虹首次入桂之行，不仅随行画稿，也作完整的作品，有《桂林山水册页》《为黄二明画桂林山水》《丈桂林山水长卷》等。1929年，“第一届全国美展”在上海举办，黄宾虹作为“参考品部”委员，展出了两幅作品，其中一件就是这次广西之行的成果之一《桂林叠彩山》，这也是将桂林山水入画，并把它推向全国的首创之举。

黄宾虹第二次到广西是在1935年，应当时广西省政府的邀请，到南宁为广西中等学校教职员暑期讲习班主讲金石学史、书法发微和中国画概论。讲习期间，应广西省政府招待各学会来桂开会委员会（当时有6个全国学术团体到南宁召开联合会）的邀请，黄宾虹拿出中国画5幅、书法1幅，与另一名画家马万里在广西博物馆举办“黄宾虹、马万里两先生中国画展览会”。当时的《南宁民国日报》做了《黄马画展极得好评观众数千人均叹为上乘之作》的报道，次日更是刊出《黄宾虹马万里两先生画展专刊》。展览盛况空前，李宗仁、白崇禧都到场参观。



©黄宾虹《阳朔山水》中国画 75cm×31.8cm 1952年

讲学结束，黄宾虹到陈柱老家北流萝村游览。在萝村期间，黄宾虹走暗螺岭，登大容山，访勾漏洞，虽已年过古稀仍坚持步行，尽览北流的奇秀风光。此后，黄宾虹又到同来讲学的国学家冯振教授（时任无锡专门学校教师）的北流民乐山围旧家。冯振与陈柱既是同乡，又是南洋大学堂（今上海交通大学）的师兄弟。黄宾虹在冯振家阅览古籍、写生山水，后来黄宾虹画成《山围小景》8幅，这些作品现藏于广西博物馆。山围位于大容山脚下，四面青山环绕，山势连绵不绝，山中村舍幽深，犹如桃花源。黄宾虹所作《山围小景》画面疏朗旷远，构图简约但疏密、藏露有致；运笔以横皴为主，势如破竹；墨色淡雅，而层次变化分明。全画恬淡明净，在自然的表现中蕴含着画家精深的功力。

黄宾虹虽只入桂两次，但却创作了不少描绘广西山水的作品。这些作品，是黄宾虹瑰丽的艺术世界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我们研究黄宾虹的艺术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材料。

3. 徐悲鸿与广西。

徐悲鸿(1895-1953)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画家、美术教育家，他在1935-1943年多次踏足广西，被聘为广西省政府顾问、广西美术会名誉会长，创办了桂林美术学院、广西省立艺术师资训练班。除了办学之外，他在广西期间还创作了大量作品。

1935年11月2日，徐悲鸿应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的邀请，前来广西南宁考察，这是徐悲鸿第一次到广西。11月5日，徐悲鸿参观了南宁广西省立第一高中，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参观后，由校长君治主持举办“将军与画家”大型联欢会，参加者有各界青年2000余人，李宗仁和徐悲鸿出席并讲话。在南宁期间，徐悲鸿曾作画并举行个人画展，有铅笔、水墨纸本画《郭德洁像》（徐悲鸿纪念馆藏）和油画《广西三杰》（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



◎徐悲鸿《漓江春雨》中国画 74cm×114cm 1937年

1936年夏，徐悲鸿再次来广西，由南京到上海乘海轮经香港，再改乘火车到广州，然后从三水乘江轮到广西梧州，再换小火轮溯桂江、漓江北上到达桂林，游览了一番漓江后于6月2日抵达南宁。当时正值李宗仁与陈济棠通电全国宣布抗日反蒋的“六一事变”，广西当局

对徐悲鸿的到来大喜过望，聘他为广西省政府顾问，允诺为他在广西发展美术事业提供方便，拟为他办一所桂林美术学院。在此期间，徐悲鸿先后画了《风雨思君子》《晨曲》《古柏》《逆风》《漓江野渡》《鱼鹰》等中国画，以寄托自己的忧国忧民之情。《晨曲》画的是光秃秃的枝丫纵横交错，许多小麻雀在叽叽喳喳歌唱，期待春天的到来，题款为“丙子，春不至”。《逆风》画了一些小麻雀正迎着狂暴的逆风振翅疾飞，表现了人民的反抗精神，题款为“逆风，丙子大暑游龙州遣兴，悲鸿”。

1936年8月中旬，徐悲鸿第二次游漓江。后来，在和李宗仁的交谈中，他多次提到漓江、阳朔之美，想定居于碧莲峰下。李宗仁便委托家住阳朔县城、曾任中将参军的张国权先生去买下了一间小屋，加以改建，赠给了徐悲鸿。徐悲鸿为此还刻了一方图章“阳朔天民”，以纪念这段岁月。

1936年10月，广西省会从南宁迁至桂林，徐悲鸿也移居桂林。此时作有《桂林风景》《雪景》《牧童和牛》《村歌》等作品。

1937年，徐悲鸿在桂林创作了《壮烈之回忆》和《风雨鸡鸣》等作品。其中《风雨鸡鸣》画的是一只站立于石头之上打鸣的公鸡，题款为：“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丁丑始春，悲鸿怀人之作，桂林。”这年春天，徐悲鸿赴长沙、广州、香港举办画展，后又返回桂林，创作了著名的《漓江春雨》。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威逼南京。正在桂林的徐悲鸿急忙赶回南京，打算将家小全都接到桂林去，但是其妻蒋碧微坚决反对。于是，徐悲鸿只好留下一笔路费给她，自己匆匆返回广西。10月，徐悲鸿应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的邀请，到重庆任教。

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期间，徐悲鸿仍惦记着创办桂林美术学院，在两个学期里均是上完两个月的课即返回桂林筹办学院。1938年1月17日至7月17日，广西省会国民基础学校艺术师资训练班（第一期）举办，该班是由徐悲鸿与时任省教育厅音乐督学的满谦子积极倡导、筹建的。7月25日至8月20日，徐悲鸿又积极倡议统一全省中学美术课程和教学方法，并在桂林美术学院举办了广西省中等学校艺术教员暑期讲习班，亲自授课。其间，徐悲鸿的作品有《象鼻山》等。

1938年7月底，徐悲鸿经友人介绍，到广西贺县八步（今贺州市八步区）住了一段时间，画有《贺江景色》（徐悲鸿纪念馆藏）、《八步晨光》等近百幅作品。1938年初冬，徐悲鸿在八步接到中央大学转来新加坡和印度的函件，邀请他去办画展，于是他很快回到桂林，积极投入到画展的筹备中。

1938年底，徐悲鸿到达香港，后又远赴新加坡、印度，进行为期四年的海外抗日宣传、募捐筹款活动，直至1942年从云南回国。

1942年秋，徐悲鸿由重庆经贵阳返回桂林。9月4日，徐悲鸿做了“印度绘画艺术”讲座。在桂林期间，徐悲鸿专程去看望了曾给他极大帮助的李济深。徐悲鸿曾画了一幅中国画《枇杷》，上面题写“每逢佳果识时节，当日深交怀李公”，其中李公指的就是李济深。

1943年初，徐悲鸿离开桂林，之后即未再来过。他在广西期间所创作的作品，记录下了

那段难忘的岁月，而他所创办的广西省会国民基础学校艺术师资训练班成为广西艺术学院前身。

4. 张大千与广西。

张大千（1899-1983）与广西的关系很特殊。高阳的书《张大千：梅丘生死摩耶梦》中，提到“张大千由水路回川，先到梧州，应徐悲鸿之约，经柳州到桂林，饱览了阳朔山水”。这一年，是1938年。张大千年谱中也记载，“1938年戊寅40岁：驻北平日本司令部多次派汉奸劝张大千出任伪职，张氏推诿不从，化装逃出北平，辗转上海、香港，入桂林途中会见徐悲鸿”。

两段记述都较为简单，其实当时的情况是张大千要逃离日本侵略军的迫害，准备回老家四川，隐居于青城山。因为之前在北京他已被秘密关押，后在友人多方营救之下才被放了出来。

回乡之行有段插曲，就是张大千托挚友晏济元带儿子心智、心亮乘轮船取道广西梧州先回重庆，自己和妻子杨宛君则留香港托运要带回四川的24箱藏画。当时经朋友帮忙，香港中航同意由杨宛君带张大千的画箱飞武汉。可是临到8月23日办理乘机手续时，被告知飞机将改在广西梧州降落，于是杨宛君决定走水路去梧州，张大千曾力阻但未能成功。不料杨宛君原定乘坐的飞机在飞行途中被日本飞机击落，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罹难。张大千闻讯自是万分庆幸。8月底，张大千抵达广西梧州，再从梧州到柳州，然后坐汽车到桂林。



◎张大千《阳朔山水图》中国画 90cm×41cm 1938年

虽然算是逃难，但张大千在桂林并不寂寞，因为有徐悲鸿等同道好友，自然少不了畅游山水、会友作画之雅事。其间，张大千和徐悲鸿在李济深的陪同下，从桂林乘船到阳朔游览写生。

船过兴坪（时名兴平）时，张大千和徐悲鸿被兴坪清幽的景致吸引，流连忘返，留在兴坪游览作画十数日。后来，张大千曾作《阳朔山水图》，并题诗道：“阳朔佳山水，多应甲桂林。卜居曾有约，魂梦接清音。”落款详细记述了此行的经过：“岁戊寅，倭寇陷北平之明年，予自两粤间关还蜀，得与任潮先生、悲鸿同社，同舟发桂林，下漓江，至阳朔，有卜居兴平之约。忽忽已是十四年矣，□岁自港致函，称任公寓京嘱画，因为写此，以报不遗在远，更乞教正。庚寅夏，弟张爱，时在大吉岭。”其中的“卜居兴平之约”，是张、徐二人对兴坪极为喜爱，李济深允诺以广西省政府的名义赠送两人各一块地皮。张、徐二人自是非常高兴，约定以后结邻而居。

《阳朔山水图》所绘山石险峻，并非桂林典型的秀丽山水，可见张大千之独特体验。此画构图别致，树石掩映有趣，山、树用笔奔放，四人乘坐小舟，则是细线勾勒，神态毕现。全画体现了张大千典型的绘画风格。此画现藏于广西博物馆，成为张大千桂林之旅的见证。

除了与徐悲鸿、李济深的这次兴坪之旅，张大千在桂林城内与旅桂诸画家的画事交往也是密切的。这些交往也有画迹留存下来。例如，他与马万里等人同游了独秀峰，并合作了一幅独秀峰画作，在作品落款中他详细题写了具体的日期：“戊寅八月九日与万里道兄同登桂林独秀峰合写此幅。”如果说张大千的其他作品只是事后的追忆的话，这幅作品则如张大千旅桂的现场留影。

不久，因著名的印度诗人泰戈尔邀请徐悲鸿前往印度，张大千急于归蜀，李济深政务缠身，三人只好依依惜别。临行，徐悲鸿将自己的收藏中张大千非常喜爱的北宋董源的巨幅山水《溪岸图》送给他。张大千非常感动，1944年春他将清代画家金农的《风雨归舟图》回赠给徐悲鸿。他们的这一段同游漓江、互赠珍藏的故事，是广西美术史甚至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张大千旅桂虽然只有一次，并且时间短暂，但他念念不忘这段岁月。20世纪60年代，他作《题赠侯北人〈桂林山水图〉》诗写道：“八桂山川系梦深，七星独秀足幽寻。漓江不管人别离，翘首西南泪满襟。”1974年作《漓江山色》一幅，题款：“此写三十年前漓江旧游，同舟者容南李任潮、宜兴徐悲鸿也。”

张大千旅桂时间短暂，所作有关广西的作品亦少，但他对广西美术的影响却很深远，因为他的艺术思想由两人传承并发散于广西，影响至深。这两人一个是马万里，一个是黄独峰。马万里与张大千亦师亦友，相交甚笃，并常有合作。黄独峰则是张大千的入室弟子。

马万里与张大千结识于上海，两人曾同人蜜蜂画社。后来张大千到桂林时，马万里与张大千、徐悲鸿一起畅游桂林山水。马万里还与张大千合作了一幅《桂林独秀峰》。此外，张大千为马万里作了一幅《九百石印精舍图》。九百石印精舍，是马万里治印斋名。张大千为好友马万里画的此图，具有张大千早期的典型风格，画的是横幅长卷，巨石掩映中，右方露出一处房舍，舍内数人应该是在治艺论道。画中巨石怪异嶙峋，是典型的桂林山石形态，以曲折有力的长线勾勒，稍加淡墨点染出向背，显得疏朗；树与房舍以重墨勾勒点苔。整幅作品显得疏密有致，浓淡相宜，藏露有趣，显然是一幅逸兴之作。画右方以篆书由右至左横题“九百石印精舍图”，继以行草竖题：“戊寅秋，桂林旅次，为万里道兄写，乞正。大千张爱。”马万里将此图裱成长卷，精选自刻存印一百六十八石，拓于图后，甚为珍爱，从不轻易示人。后来马万里到

青城山拜访张大千，大千复于行首补题“陶铸吉金乐石”六字，下署“既为万里老长兄作图，复题其专，爰”。在四川，马万里与张大千再度合作《登秋山图》、《高仕松竹图》（张大千画高仕，马万里写苍松，罗文谟作墨竹）等作品。其间，张大千还将一张自画像赠予马万里。张大千于自画像中题曰：“大千居士四十二岁自画像。奉贻万里老友，时同在青城山中，庚辰六月十日也。”又刻白文三字印“不犹人”赠之，此印边款为“大千为万里刻”。而马万里也曾为张大千治过六七枚印章。

此外，张大千、徐悲鸿、马万里合作的《岁寒三友图》（张大千写松，徐悲鸿画梅，马万里补竹），则是张大千旅桂时所作，记录着他们之间的情谊，成为艺林佳话。

应该说，马万里与张大千是亦师亦友的关系，马万里从张大千处获取了不少艺术的营养，而马万里对广西的美术影响甚多，其后人及弟子也多有成就，间接地，也是张大千对广西的美术产生积极的影响。

而另一个从张大千处承接了艺术的精华，对广西美术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则是张大千的人室弟子黄独峰。

黄独峰自幼随揭阳本地画师学习任伯年派花鸟画，18岁入春睡画院师从岭南画派名家高剑父，后来还与高剑父创办南中美术专科学校。后来黄独峰认为岭南画派“创新有余，传统不足”，想取长补短加深中国画的艺术传统，使自己的画能进一步发展，于是在1950年，至香港投入张大千门下，学习传统艺术精华。后来的事实表明，师从张大千后的黄独峰确实画风大变，艺事大进，张大千幽默地评价黄独峰的画：“过去打少林拳，现在打太极拳。”

黄独峰后学历任广西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副院长，广西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主席等职，培养出黄格胜、陈玉圃等弟子，可以说是把张大千的传统艺术精华的种子撒播在了广西这片土地，并开枝散叶，发扬光大。

由此可见，张大千对广西美术的影响是巨大的。

5. 丰子恺与广西。

丰子恺(1898-1975)，乳名慈玉，学名丰润，后改丰仁，曾用名丰仍。浙江桐乡人。赴日留学回国后，任职于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1938年6月24日，丰子恺一家到达桂林，他是接受广西省教育厅邀请，为广西省中等学校艺术教员暑期讲习班教授绘画，并接受唐现之的邀请到桂林师范学校任教。

1938年7月25日至8月22日，丰子恺在暑期讲习班授课，他后来将讲课内容写成《艺术必能建国》、《桂林艺术讲话》（之一、之二、之三）。8月25日，丰子恺参加了桂林师范学校新生录取工作，后来任美术、图画、国文教师，并多次为学生演讲，为校歌谱写了曲子。其间，他积极参与桂林抗战美术运动，为在桂林出版的《中学生》《黎明》《抗战文化》《救亡日报》《大公报》等报刊撰文作画或做封面设计。

1939年4月6日，丰子恺因收到马一浮的来信，欲前往浙江大学任教，于是离开了桂林。1944年2月，他曾到桂林办个人画展，展出作品近百件。

丰子恺在桂林的时间不长，约9个月，但他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财富。第一是文章。

主要有在桂林期间结合教学实践撰写的大量关于艺术和艺术教育的论著、教材，如《桂林艺术讲话》（之一、之二、之三）、《艺术必能建国》、《图画常识》、《艺术修养基础》、《漫画的描法》、《艺术与人生》、《艺术学习法及其他》等专著和《画碟余墨》《评中国画风》《谈抗战美术》《中国画与国文》《我所见的艺术与艺术家》《美术的基本》《中国画与西洋画》《中国画的特色》《谈壁上标语》等一大批理论文章。他最为著名的日记体散文集《教师日记》也是在桂林从教期间开始撰写的。

第二是思想。丰子恺的教育思想，至今仍影响着现在的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教学。丰子恺在桂林师范学校授课期间，重视美术和音乐教育。在教育理念上，他采取先从理论而至实践的艺术教育方法，使学生通过掌握美术知识与欣赏能力，由浅入深，稳步入门。丰子恺对学生说，作为一个绘画者，应有一定的美术理论素养，“不为纯粹之技术家或画家”。他认为“艺术不是孤独的，必须与人生相关联；美不是形式的，必与真善相鼎立”，“图画有一种精神——图画精神，可以陶冶我们的心”，美术的学习即是“用艺术来启发人的‘艺术的’心眼”。在艺术教育实践中，丰子恺认为技法传授只是过程，其主要目的是培养“艺术的心”。通过“艺术的心”的培养，来实现艺术教育作为完善学生人格、促进学生精神修养的基础教育之目标。他说：“有技术而没有‘艺术的心’，不能成为艺术；有‘艺术的心’而没有技术，亦不能成为艺术。但两者比较起来，在‘人生’的意义上，后者远胜于前者了。”

此外，丰子恺本着教育不忘救国的思想，在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与抗战宣传紧密结合起来。他不仅简明扼要地向学生讲解绘画基本常识和创作要领，而且教大家如何搜集现实生活素材，制作抗战宣传画。1938年12月，敌机空袭桂林，炸毁不少民房，百姓伤亡惨重。桂林师范学校师生群情激愤，集会控诉日本侵略军暴行。丰子恺即将此事与教学相结合，要求学生每人画一幅控诉日本侵略军罪行的漫画。他又根据大家交来画稿中存在的弊端，以“控诉日机暴行”为题进行讲解示范，然后要大家修改，并带领他们上街下乡张贴宣传。他还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创作大量的抗战漫画，如《轰炸》（一）、《轰炸》（二）、《停杯投箸不能食》、《腰下防身剑，摩挲日几回》、《散沙团结，可以御敌》、《战地之春》、《大哥同小弟》、《漫画日本侵华史》、《抗战漫画集·保卫大广西》和《漫画阿Q正传》等。为了更好地发挥丰子恺抗战漫画的宣传作用，学校特地大量印制其漫画，发动师生到处张贴。

第三是作品。除了上述漫画作品，丰子恺还对广西的民风习俗、工艺品深感兴趣，画了不少插图。他对广西妇女边干活边用背兜背着娃儿印象很深，并认为当地吃饭用的低矮的桌椅板凳、广西民众的灰布装束、勤劳的桂林劳动人民形象等无一不体现了广西人的纯朴与热情。而价廉物美的竹篮、竹盒、竹碗，两江圩上的折纸灯，永福的土制小罐形油灯、民居饰花纹的木窗、大门门闩、装饰简单而美观的花纹的牛棚木窗等民间工艺品则“具有古朴的巧”与“古朴的美”，“兼顾美术与实用”，显示了广西劳动人民特有的智慧。他的这些桂林见闻作为插图作品收入《广西所见》（1~4）集子中，为我们研究桂林抗战时期的民俗文化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

此外，丰子恺为桂林师范学校校歌所谱写的曲子，至今仍在传唱。

当然，桂林也回馈了丰子恺。桂林的秀丽山水，使丰子恺的画风由人物为主变成山水为主，由小幅变为较大幅，由简笔变为繁笔，形成了新的绘画风格。

6. 马万里与广西。

马万里(1904-1979)，原名瑞图，字允甫，又字万里，号曼庐、大年、拿云阁主、曼福堂主等。江苏常州人。篆刻家、书画家。1924年毕业于南京美专，曾任职于上海美专、上海中华大学。1935年，偕黄宾虹到广西游览山水名胜，后在广西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工作。1936年7月，与徐悲鸿等筹办了广西第一届美术展览会，展出徐悲鸿、张大干、齐白石、张聿光、汪亚尘、高剑父、刘海粟等名家及广西画家的作品。后在桂林从事抗战美术活动，至1944年秋离开桂林。



◎马万里《为李济深祝寿图》中国画 148cmn×73cm 1954年

马万里在桂林期间勤奋创作，并为抗战和公益事业义卖募款。据载，1937年11月初，马万里参加广西妇女抗敌后援会主办的书画义卖，捐画达20幅，画价由会长郭德洁主持评估，他的作品与徐悲鸿的作品同价。1941年10月，马万里与郑明虹、帅础坚等创建了桂林美术专科学校，郑明虹任校长，李济深任校董事长。次年，学校更名为私立桂林榕门美术专科学校，马万里任校长兼中国画系主任。阳太阳、黄新波等均应聘任教。马万里交游广泛，与诸多名画

家均为好友。在桂林期间，马万里与旅桂名画家多有合作，如由马万里画竹、张大千画松、徐悲鸿画梅的《岁寒三友图》，马万里与张大千合作的《云溪精舍图卷》、《九百石印精舍图》、《桂林独秀峰》（徐悲鸿题词作序）等。后三幅为广西博物馆藏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万里移居北京，1960年重返广西，曾任广西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广西政协二届、三届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广西分会理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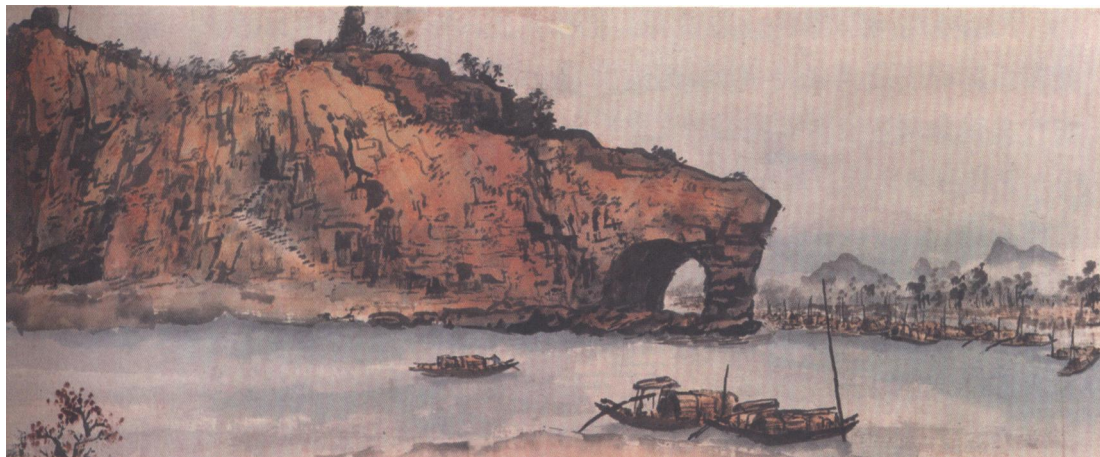
马万里画作以花鸟见长，多为小写意风格，作品无论是状物象形还是笔墨来源，均讲究法度谨严，一丝不苟。其运笔温文尔雅，不疾不徐，看似恬静无奇，实则内蕴有力而富有生机。作品多设色，用色清丽、雅致，犹如春风拂面。整体风格类恽寿平一派，画工尽精但稍乏创新。

除了积极创作，担任行政事务，马万里还积极在广西从事艺术教育工作，他是把海派、皖派、浙派美术技法与理念传入广西的第一人。他在广西的弟子有罗叔子、杨宇云、王济亨、罗鼎华、喻云龙等。其女马慧先，扎根广西，画花卉颇有父风，50岁后所作紫藤葡萄，深得马万里之神韵。马万里外孙马腾蛟，亦从事画艺，得家门之法。杨宇云则继承马万里书法、治印之衣钵。他早在少年时就和马万里结缘于桂林，是马万里的爱徒之一，得马万里书、印精工雅致、高古清丽之神貌。杨宇云又惠泽后学。可以说，对于在广西发展书法篆刻事业，乃至后来出现的“广西现象”，马万里可算是源头。

7. 关山月与广西

关山月(1912-2000)，原名关泽霈，生于广东阳江。著名中国画家、教育家，岭南画派代表人物。早年就读于广州市立师范学校，刻苦自学绘画。后得到岭南画派主要创始人高剑父先生的赏识，免费进入春睡画院，成为高氏入室弟子，高剑父为其改名关山月。1948年任职于广州市艺专。1958年后，历任广州美术学院院长，广东艺术学校校长，广东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常务理事，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1939年，关山月以《渔民之劫》等作品，参加了苏联“中国美术作品展”。同年秋至1940年春，他首次于澳门、香港和湛江举办个人画展。之后，他自广东出发，游历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青海、陕西等地，深入生活，收集素材，边写生边创作，并沿途举办个人画展，以卖画维持生活和筹措资金。1940-1941年，他先后两次到广西，在桂林创作、展览活动频繁，影响很大。



◎关山月《漓江百里图》(局部) 中国画 32cm×2874 cm 1941年

1940年9月22日，关山月和一些画家捐献画作义卖，募寒衣支援前线。10月31日，关山月在乐群社礼堂举行“关山月画展”，共展出参加过苏联“中国美术作品展”的《三灶岛外所见》《渔民之劫》《渔娃》，香港个人画展的《从城市撤退》《游击队之家》，以及来桂林后所画的桂林山水、人物画等100多幅。其中有10多幅桂林山水画和表现侵略者末日的宣传画，为桂林艺术爱好者出巨资购买。同日，《救亡日报》出版《关山月画展特辑》，有广西临时参议会议长李任仁的文章《略谈山月的作品》，以及陈此生、何曼叔、刘侯武等的文章。副刊《文化岗位》发表夏衍的《关于关山月画展特辑》。

1941年3月15-16日，关山月在广西建设研究会举行画展，其中有长卷《漓江百里图》(32cm×2874cm)，关山月把漓江两岸美景从桂林一直画到阳朔。据载，这是以《漓江百里图》为题的第一幅创作作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41年8月8日，关山月赴渝举行画展和赴川、滇、黔写生后返桂，继续进行创作。9月1日，关山月和周泽航、欧少严、倪小迂举办四人画展。

12月5日，关山月在广西省党部礼堂举办“多为农村写生”画展，共展出作品近100幅。

关山月在广西进行了大量的写生创作，无论是对抗战文化的贡献，还是对广西美术创作事业都有极大的影响。

三、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美术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北平、上海、广州、武汉等大城市的相继沦陷，大量的文化人要重新寻找安全的栖息地，桂林综合以下因素，成为这一时期他们的必然选择。

首先是桂林具有的地理位置优势。广西位于祖国的南疆，距离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东北较远。广西的省会于1936年从南宁迁往桂林，而广西第一次遭受日本侵略军的袭击是在1939年末，遭到袭击的地点是南宁及其周边，并且当时日本侵略军的主要目标并不是广西。广西第二次遭到日本侵略军的残暴袭击是1944年，这次造成了广西的彻底沦陷。但是相比较中国的其他地方，广西还是显得相对安全。

其次是相对蒋介石政府而言，在桂系统治下，桂林的文艺政策比较开明。蒋介石政府对待进步的文艺事业采取的是打压甚至摧残的政策，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而桂系的文艺政策相对而言比较民主。

北伐战争之后，蒋介石一直视桂系为心腹大患。他曾经以“勾结桂系，拥兵自护”的罪名扣押桂系李济深，还曾经为了消灭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而极力拉拢亲汪分子唐生智和张发奎。1934-1935年，桂系多次派人赴上海和南京刺杀蒋介石。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桂系不管是李宗仁还是白崇禧，又或者是黄旭初，都希望能够吸引人才来到广西。因此，广西在桂系的统治下，对待文艺的政策与蒋介石政府背道而驰也是意料之中的。

再次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很好地团结了桂系政府，团结了来桂的文化人，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的文化宣传工作。

可以说，桂林成为抗战文化城是聚集了多方因素的结果。据统计，当年在桂林较知名的画

家就多达 250 名，几乎集全国美术界高手于一地。其中，著名木刻家有李桦、赖少其、黄新波、刘建庵、陈烟桥、温涛、杨秋人、杨纳维、梁永泰、蔡迪支、陆田、易琼、武石、野夫、龙廷坝、林仰崢、王立、陈望等；著名漫画家有叶浅予、廖冰兄、余所亚、盛特伟、沈同衡、丁聪、刘元、汪子美、张光宇、张正宇、黄尧等；著名中国画家有徐悲鸿、张大千、丰子恺、何香凝、赵少昂、李可染、关山月、马万里、周千秋、张安治、张家瑶、帅础坚、宋吟可、王焕夫、阳太阳、尹瘦石、黄独峰、冯法祀、黄养辉、黎雄才、刘仑、朱培钧、罗鼎华、陈雨田等；其他著名画家有李铁夫、曹若、符罗飞、沈逸千、艾青、黄茅、张仃、沈士庄、徐杰民、郁风、陈晓南、李白凤、林半觉、黄超、赵望云、梁鼎铭、梁中铭、陈海鹰、曾恕一、黎冰鸿、陈仲纲等。

当时的美术团体和美术教育机构也非常兴盛，有中华全国漫画作家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漫画宣传队、工商美术供应社、广西省立艺术师资训练班、广西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等 35 个。美术刊物、专著的出版发行更是呈现出异常蓬勃的景象，具有代表性的有《漫画与木刻》、《阵中画报》、《救亡木刻》、《抗战木刻选集》、《木刻教程》（李桦著）、《漫画的描法》（丰子恺著）、《中国画法概说》（张家瑶著）等。

桂林文化城美术活动也是异彩纷呈，画展、讲座、研究会、交谊会、训练班等活动时常开展，其中有记录的重大活动大概有 109 个，如“留桂画家抗战画展”“丰子恺画展”，万昊、阳太阳、盛此君等十一人油画展，响应捐募寒衣运动义务画像活动，儿童绘画运动，战时绘画训练班，桂林中学战地服务团漫画壁报训练班，欢迎徐悲鸿访问印度归来晚会等。

1. 美术教育。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文艺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抗日救亡运动。1938 年，广州、武汉相继失守，两地的文化人分散到重庆、昆明、桂林和香港，并以此作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大后方。香港失守后，在港文化人大多数也来到了桂林。因此这两次大量迁来的文化人在桂林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文化力量，艺术也成为动员、团结民众和宣传抗日的有效手段之一。而此时桂林的美术教育质量不高，师资短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绘画训练班、研究会、讲习班、讲座等纷纷涌现。著名美术教育家也开始积极兴办各类美术学校，有徐悲鸿、张安治等创立的广西省立艺术师资训练班，马万里、龙潜等创办的私立桂林榕门美术专科学校，阳太阳创办的初阳美术学院，赵少昂、周千秋创办的岭南艺苑桂林分苑，郑明虹创办的桂林美术专科学校，以及象山艺苑、紫金艺社等。

除了成立美术学校，固定系统地培养美术教育人才外，各方力量相互合作，还举办了不少短时训练班。如 1940 年 2 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举办了为时三个月的“战时绘画训练班”，黄新波、盛特伟、黄茅、廖冰兄、沈同衡等人任木刻漫画课教师。

1940 年 8-9 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和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联合举办为期一个月的暑期文艺写作研究班，宗旨是推广战时文艺研究，爱好者均可报名免费参加。温涛和黄新波代表美术界分别讲授木刻艺术和绘画艺术。

2. 主要活动概况

在桂林抗战文化城，美术类的重大活动一般为画展和讲座。当时的美术团体和机构有抗战后迁至桂林的，也有在桂林成立的，大约有 35 个。大多数团体举办过画展和讲座，比较有影响力的团体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漫画宣传队、中华全国漫画作家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漫画作家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广西美术会、广西版画研究会、广西省立艺术馆美术部、国防艺术社美术部、广西省立艺术师资训练班、初阳美术学院、桂林美术专科学校、桂林美术学院、岭南艺苑桂林分苑、漫画教育社、西泠书画社、雅脱书画社、工商美术供应社、舞台美术供应社、舫湖金石书画社驻桂林办事处、中国美术社桂林分社等。正因为有这样强大的机构和组织，所以抗战时期桂林的美术活动质量都比较高，涉及面也相对广。

展览。在抗战时期，桂林的美术展览搞得有声有色，出现较多的画种为中国画、木刻和漫画。在桂林抗战文化城形成之前，桂林的美术生态比较简单，几乎只有中国画一种形式，题材传统，多为山水、人物和花鸟画。当全国的艺术名家和具有影响力的机构、团体云集桂林时，桂林的美术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术展览也摆脱了以往小范围、小众传播的模式，开始广泛向大众传播开来。来到桂林的画家都不再是躲在象牙塔中只管艺术创作的艺术家，而是奋勇走进血腥残酷的现实当中，拿起画笔当武器的战士，将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用绘画的方式揭露出来，并用画展作为宣传媒介，唤醒民众的抗日意识，鼓舞前线战士的士气，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感。在这样的时势要求下，中国画的传统题材的局限被打破。而在抗战中起到主要宣传作用的画种是漫画和木刻。漫画和木刻的表达方式直观明晰，对观者的文化程度没有要求。从展览途径来说，漫画和木刻的展览形式灵活，不需要完整专业的展厅和室内空间，甚至墙壁上、屋檐下，街头、巷尾都可以成为展览的场地，这对于战时大众宣传而言是不二的选择。但是由于漫画、木刻展览不需要专门的场地，展览次数难以完全统计，因此在做 1937 年 7 月至 1944 年 6 月桂林美术展览数据统计时，中国画的展览场次（68 场）仍然比漫画（33 场）和木刻（16 场）多。不过漫画和木刻展览的普及面和影响力并不能单从展览场次来估算。

在此期间，重要的美术展览不胜枚举，据不完全统计，1937 年 7 月的第二届美展、第三回木刻流动展、李桦先生第二次木刻展，同年 10 月的“阳太阳个人画展”、“妇女抗敌后援会书画用品展览”（参展艺术家有徐悲鸿、马万里、张家瑶、符拔雄等），11-12 月由赖少其策划的“抗战漫画展览”巡回展等在初期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到了 1938 年，展览数量更是激增，仅 1 月份就有 5 个展览：中华全国漫画作家抗敌协会在桂林初中举办“全国第一届漫画展览”，并于展览结束后进行各地巡展；广西美术会举办“慰劳画展”；香祖书画社在桂林市商会举办“劳军画展”；“抗敌漫画展览”在桂林初中图音教室举办，展品有桂林初中在校学生的漫画习作、文章、诗歌、歌曲等；“广西全省美术展览会”，由国防艺术社和广西美术会主办，展品种类繁多，涉及美术作品和抗战战利品，收益所得支援前线。在这一年，木刻和漫画展览的活跃度也很高：3 月，国防艺术社短训班举行结业展览，展品包括木刻、绘画、曲谱、剧本等；5 月，国民革命军和国防艺术社共同举办“五月街头漫画木刻展”；8 月，

广州培正中学暴风剧社在乐群社举办“抗战绘画流动展览”，展品有木刻、漫画、连环图

书等；9月，国防艺术社举办“街头漫画展”；中华全国漫画作家抗敌协会华南分会会员梁飞燕在乐群社礼堂举办“全国漫画展览”；11月，中华全国漫画作家抗敌协会华南分会举办“抗战漫画街头展览”。1939年，随着抗日愈发激烈，漫画宣传作用随之增大，漫画宣传队相继成立，活动增多。1939年5月，漫画宣传队从桂林出发，先后到达阳朔、平乐、梧州、桂平、南宁、柳州举办画展，与当地美术工作者进行交流，探讨时下美术界急需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漫画性质的巡回展也开始增多，这一年的漫画展览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漫画宣传队举办的“漫画展览”，廖冰兄、黄茅等人组成的漫画宣传队在全州、湖南等地举办的“漫画巡回展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漫画宣传队在桂林桂东路举办的“街头抗战漫画展览”，绥靖主任公署政治部在桂林河口码头举行的“抗战漫画展”，漫画宣传队在桂林和粤北举办讨伐汪精卫、配合全国反汪运动的画展，国防艺术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漫画宣传队、阵中画报社在乐群社礼堂联合举办的“留桂画家抗战画展”，桂林行营漫画宣传队在柳州繁华地点举办的“街头抗战漫画展览”。木刻也是1939年展览的重要类型，最重要的木刻展览当属1939年10月“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鲁迅木刻展”。此展览在桂林乐群社礼堂举行，作品包括中外木刻，共计400余件。1940年10月，“木刻十年纪念展”在桂林举办。1940-1943年，展览规模不断扩大，几乎每个月都有好几场各种绘画形式的大型展览。

讲座。由于抗战时期的美术团体数量众多，因此在桂林的美术讲座类型多样，有暑期讲座、系列讲座、座谈会、联谊会等，有美术教育普及型的讲座和注重专业性的纯理论讲座，主办方多元，名家荟萃，学术活动十分频繁。而在地点的选择上也不拘泥于专业场所，在曾经举办讲座的场所中，既有专业场所（如艺术馆），也有非专业场所（如桂林初中）。云集在桂林的画家认识到：绘画不只是阳春白雪，还应该成为宣传的武器。《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刊登有一篇《中国绘画工作同人致苏联同志书》的文章，里面就明确指出：“中国能够战胜日本不仅是武力，也还需要政治的宣传，所以绘画给予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是和飞机大炮给予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一样重要的。”

这一时期的美术讲座不仅为美术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还是战时宣传抗日、动员民众抗日、团结各界人士的重要途径。

抗战时期，桂林最早的美术讲座是1937年7月，广西版画研究会在桂林初中举办的关于木刻以及刻刀的使用的讲座，主讲人为李桦；随后是11月桂林初中主办的“图画学习法”，主讲人为张安治。1938年的讲座仅有一场，为在广西美术学院举办的广西全省艺术教师暑期讲习班，主讲人为徐悲鸿。1939年可考的讲座也仅有漫画与木刻社于5月举办的作者座谈会，主讲人为陆志庠，主要内容为“推进当前漫画与木刻运动”。1940年激增至15场，包括桂林美术界第三次联谊会，联谊会涉及的内容包括战时绘画技巧和内容，以及目前绘画的创作中心等；“漫画木刻讲座”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漫画宣传队与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主办，温涛、黄新波和李桦就漫画与木刻运动的本质、内容、技巧和历史展开讨论；留桂美术家分别召开了两次美术座谈会，讨论绘画工作者的修养；桂林美术界第八次联谊会在阵中画报社举行，针对世界名画进行观摩评研；广西省立艺术馆美术部先后7次举办暑期美术讲座，主讲人有刘

元、徐杰民、黄新波、徐德华、孟超和张安治等，涉及内容包括宣传画的创作问题、绘画的内容与形式、中国木刻运动、绘画制作与欣赏、民族形式问题、美术与社会和绘画艺术等。最多的一个月（1940年8月）举办了8场美术讲座。1941年，先后举办的讲座有：“美术与社会”“习画的步骤”，主讲人分别为张安治和徐杰民；绘画研究会讲座“绘画的自修问题”，主讲人为徐德华；广西省立艺术馆美术部先后6次举办暑期美术讲座，主讲人有张安治、徐德华、刘元、刘建庵、徐杰民和傅思达，涉及的内容包括中国画与西洋画、美丽的时代性和永久性、传画研究、木刻研究、美术的新旧与真伪、翰墨的欣赏；“艺术与时代”，主讲人为雷沛鸿；“中国画法之研究”，主讲人为袁昌；广西省立艺术馆美术部先后5次举办暑期美术讲座，主讲人有梁鼎铭、孙福熙、徐德华、傅思达，讲座主题有“三民主义美术论”“生活艺术化”“怎样看画与怎样学画”“从中国画的工具论到精神”。1942年的讲座仅查到徐悲鸿在广西省立艺术师资训练班举办的讲座“印度的绘画艺术”。

3. 主要美术出版刊物的发行情况

抗战时期的桂林文化城接纳了大量内迁的文化出版机构和教育机构，这一时期的报纸、期刊、图书等文化出版物具有较高质量，久负盛名的当属夏衍的《救亡日报》。在美术领域，文化出版物大多为期刊，接近40种。美术期刊内容包括美术教育、艺术形式、艺术技法、思想讨论、时政报道等，办刊方式十分灵活。战时的美术期刊有着厚重的时代背景，艺术性与战斗性、宣传性结合，为宣传美术和团结抗日力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1938年起，就不断有美术期刊出版发行，如：《战时艺术》，半月刊，由国防艺术社美术部主办，1938年创刊；《救亡木刻》，旬刊，是《救亡日报》（桂林版）开辟的副刊，1939年创刊，1939年11月更名为《漫木旬刊》；《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半月刊，由桂林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杂志社出版，赖少其主编，桂林新知书店负责印刷发行，该刊为《漫画与木刻》《工作与学习》的合刊，用正反两个封面标明两个刊名；《音乐与美术》，月刊，广西艺术师资训练班编；《漫画木刻月选》，月刊，桂林南方出版社出版；《木艺》，月刊，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编辑出版；《艺术新闻》，月刊，艺术新闻社出版；《漫画专刊》，音乐与美术出版社出版；《阵中画报》，阵中画报社出版。但是这些期刊大多因为国民党的查封而中途停刊。

除了美术期刊外，还有其他的美术抗战宣传书籍，如黄新波的《木刻新选》《心曲》《老当益壮》，丰子恺的《客窗漫画》《漫画阿Q正传》《抗战漫画集·保卫大广西》，刘建庵的《阿Q的造像》《高尔基的童年》《西洋美术选集》，李桦的《漫画教程》《美术新论》《抗战水墨画集》，盛特伟的《我控诉》，温涛的《香港之时劫》，张安治的《苦难与新生》等。

纵观这个时期的美术出版物，几乎都旗帜鲜明地宣传抗日，发表在刊物上的美术作品题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军民团结抗日的事迹、战争中惨烈的场面以及对日本侵略军暴行的讽刺、批判的刻画。除了美术作品外，刊物刊登的内容还有美术理论、美术技法，主要的绘画类型大致为木刻、漫画、素描、速写四种。

此时，曾在美术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文化名人包括徐悲鸿、丰子恺、傅抱石、张安治、陆其清、张家瑶、艾芜、沈同衡、汪子美、徐德华、赖少其、徐杰民、刘建庵、郭沫若、夏衍等。

他们针对抗战时美术的功能、画家的责任、美术大众化的方式和中国画改革等重要问题展开了深层次的探讨。

第四节 历史文献记载中的美术

民国时期，散见于文人、画家的文集、传记或题画中有关广西美术的记载较多，例如黄宾虹的《粤西纪游》诗草有 32 首之多，陈柱的《守玄阁文稿选》和陈中凡等人的文集中均有黄宾虹粤西游画的记述。《李宗仁回忆录》记述了李宗仁与齐白石的一段往事：“此外还有少数北方耆宿也时因个人生活发生困难，来行营请求救济的。如八十高龄的老画家齐白石先生即其一例。他老人家时以无法买到米、煤而来看我。我无善策可想，只得在行营人员配额中酌量拨出一些米、煤奉送给他。白石先生居然认为我能‘礼贤下士’而万分钦佩，特地绘了一寿桃横幅，亲自送来，以为我夫妇寿。这幅杰作现在还悬在我客室之内。”廖静雯著的《徐悲鸿一生》也详细记述了抗战时期徐悲鸿在广西的美术活动。其他相关记述也是不胜枚举，在此不做赘录。

可喜的是，民国时期有了两本专门的广西美术著述，尽管这两本著述基本上仅对画家的生平和风格做了介绍和简评，缺乏史论的构架，且基本上只录清和民国画家，但是也属难能可贵的史料了。下面对这两本著述做简要介绍。

一、孙贻《粤西画识》

孙贻，原名宏，字克纯，号贻公，广西桂林人，擅长写诗和画花卉。该书汇集了元、明、清至民国众多广西画家的生平简历，分上、下卷对他们的作品和艺术风格做简括的介绍。上卷介绍的画家有丁方钟、蓝祥、释水月、周位庚、朱伦、罗存理、罗辰、罗杏初、胡椿、胡恋如、刘勛、蒋仁、蒋东垣、马晴峰、马秉良、严靖、李熙垣、李冕、李益寿、李吉寿、李洵、李翰华、宋培基、龙启瑞、何慧生、王拯、陈鏊、刘晋、刘禹、苏汝谦、倪鸿、胡中玉、陈瀛藻、石成瑞、秦致祐、陈璠、谢元麒、谢钟材、粟楷、粟稔、朱德树、欧阳燊、左绍思、董琪、阳煦、曾子仪、阳元晖、刘璘、居庆、孙太夫人，下卷介绍的画家有宋杞、陈伯猷、周思谦、李开芳、凌必正、夏美、朱若极、莫如涛、宋思仁、陈樽、钱楷、华冠、蒋维勤、方勋、汪鸣珂、汪为霖、宋光宝、孟觐乙、李秉礼、李秉钺、李秉铨、李秉绶、李宗涵、李宗淮、李慧、李宪乔、蒋屿、吕培、张祥河、蒯嘉珍、吴昌寿、张敬修、居巢、居廉、汤懋名、孙樵、田瑚、汤维翰、罗文晖、孙蒙、孙第培、鄢琦、黄玉柱、葛本植、席夔、黄槐森、谢光绮、翁绶琪、周文献。该书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有藏。

二、莫固《桂林画录》

该书搜集了历代桂林籍和旅居桂林的画家 160 人的传记，编者对每个画家的生平、创作艺术风格做了简练扼要的介绍，材料具体，为研究广西的中国画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书中按朝代记录画家。元代有丁方钟。明代有释通济。清代有 51 人：罗存理、朱伦、周位庚、朱桓、朱依真、胡椿、刘勛、蒋学山、蒋仁、周瞻岱、马秉良、马荣升、李熙垣、李吉寿、龙启瑞、陈鏊、王拯、苏汝谦、刘晋、倪鸿、严靖、刘禹、宋培基、白照、陈瀛藻、粟楷、石成瑞、

秦致祐、谢元麒、朱树德、张嗣熙、傅绍衡、张燕铭、左绍思、董琪、陆荣晖、阳煦、阳元晖、唐景崧、萧元文、于丹、刘磷、龚定求、谢启华、谢启发、以景福、易简、王寿龄、尹兆昌、周涣恩、李春霖。民国有 16 人：何锡龄、黄以材、黄蓟、罗树仁、陈秉信、王翼、黄元、孙贻、龙潜、侯晋祥、欧阳昭、许鉴、许治、白瘦渔、秦完尧、阳朗然。另记有闺秀 8 人。即明代有瞿观至，清代有商继员、胡婁如、罗杏初、何慧生、马伟，民国有袁佩芳、陈莹华。该书附录部分记有游寓桂林的其他文化名人 22 人。明代的有沈政、瞿元镜，清代的有蒋屿、李秉礼、孟觐乙、宋光宝、李宪乔、张维屏、杨翰、余文植、汪鸣珂、铨汀、居巢、葛本植、赵准、汤维翰、谢光绮、孙樗、孙蒙、罗文晖，民国的有吴源瀚、陈树人。该书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桂林市图书馆有藏。